

西德外交风云纪实

威廉·格雷韦 著

西德外交风云纪实

威廉·格雷韦 著

梅兆荣等 译

世界知识出版社

RÜCKBLENDE

(1976—1951)

Wilhelm G. Grewe

Frankfurt/Main, Berlin, Wien: Propyläen, 1979.

根据普鲁皮雷恩出版社1979年版本译出

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

梅兆荣、陈用仪、冯文光、陈国雄、崔守明、
刘昌业、卢永华、王延义、王泰智和陶象震同志。

全书由梅兆荣同志统一校订。

西德外交风云纪实

威廉·格雷韦 著

梅兆荣等 译

* *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外交部街甲31号）

89920部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32开本 印张：22.25 插页：6 字数：574,000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300

书号：3003·1676 定价：2.85元



格雷韦全家一九七五年夏在东京。



一九五五年九月，格雷韦返回弗赖堡大学参加五百周年校庆。

明仁皇太子
和美智子王妃在
大使官邸参加家
庭音乐会。



按日本礼仪
习惯点燃艺伎递
给的烟筒。



一九七六年
在乌兰巴托：递
交国书前检阅仪
仗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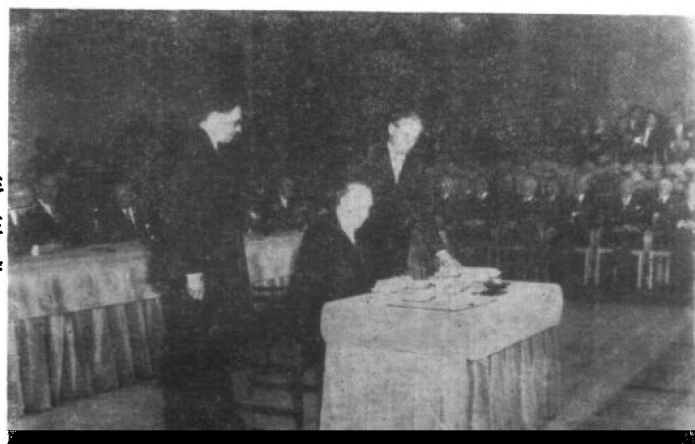


**勃兰登堡
大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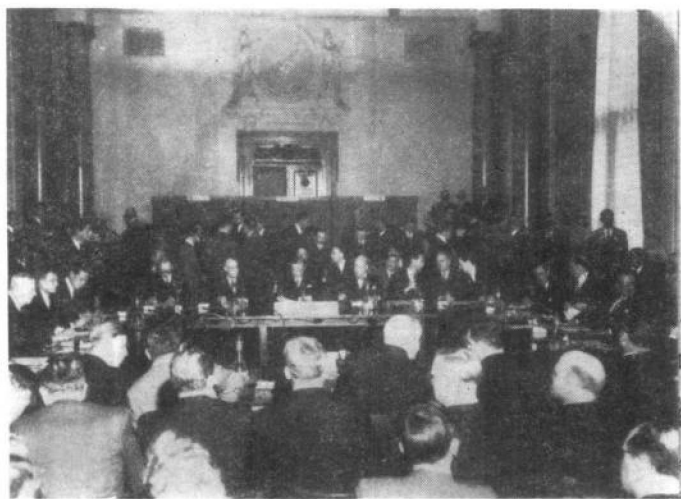
**一九五一年
西方三个占领国
的外长同阿登纳
在巴黎会晤。左
起：艾奇逊、阿
登纳、舒曼和艾
登。**

**一九五二年
五月，阿登纳在
波恩签署德国条
约。**





联邦德国代表团出席一九五四年召开的伦敦九国会议。



一九五四年一月在管制委员会大厦的大会议厅里举行四国外长会议。



一九五四年十月联邦德国、法国就萨尔地区的欧洲地位问题签订协定。



一九五五年九月，苏联领导人为欢迎
联邦德国代表团在大剧院举行盛大演出。



一九五五年八月在一次散步途中
讨论联邦总理的莫斯科之行。



联邦德国、法国外长于一九五六年十月在卢森堡签署萨尔协定。



一九五七年七月，西方三大国和联邦德国的柏林宣言起草小组在波恩开会。



一九五八年一月，哈尔斯坦出任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主席，联邦总理举行送别宴会。

一九五九年五月至八月在日内瓦召开危机会议。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咨询代表团坐在“小儿席”上列席会议。



阿登纳同肯
尼迪谈话。



一九六〇年
三月，阿登纳在
赴日途中同艾森
豪威尔、赫脱等
谈话。



一九六四年八月，驻北约大使格雷韦在那不勒斯视察南欧盟军总司令部。





北约秘书长布罗西奥（戴毡帽者）观察联邦国防军的装甲步兵表演。



一九七三年十月田中首相访问波恩。

内 容 简 介

这是一部记载战后西德外交风云的回忆录。作者威廉·格雷韦是阿登纳时代波恩重大外交决策的为数不多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之一。他曾代表西德同美、英、法三个战胜国谈判废除对德占领法规，参与制订了《德国条约》。一九五五年，他随阿登纳访问苏联，同赫鲁晓夫谈判关系正常化问题，随后即拟订了著名的“哈尔斯坦主义”。在整个五十年代，他以不同的身份参加了东西方关于德国和柏林问题的各种国际会议。在其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外交生涯中，历任外交部法律司长、政治司长、驻美大使、驻北约理事会代表以及驻日本兼驻蒙古大使，经历了阿登纳、艾哈德、基辛格、勃兰特和施密特四任总理的执政时期。循着作者职务和工作地点变更的路线，本书生动地描绘了历次国际危机、会议和谈判的背景、内幕和结局，回顾了作者同当年的大人物会晤的情景，介绍了驻在国的风土民情和政策梗概。

目 录

第一部分	出使远东	(1)
第一章	终点站日本	(1)
第二章	第二顶乌沙帽：驻蒙古大使	(83)
第二部分	五十年代的波恩	(107)
第一章	德国条约取代占领法规	(107)
第二章	法律司和柏林会议	(137)
第三章	伦敦会议和巴黎条约	(176)
第四章	在外交部的领导岗位上	(198)
第三部分	出使华盛顿	(315)
第一章	驻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大使	(315)
第二章	驻肯尼迪政府的大使	(424)
第四部分	为大西洋联盟服务	(563)
第一章	在巴黎北约理事会任职	(563)
第二章	和北约理事会一起在布鲁塞尔	(634)
总 结		(700)

第一部分

出使远东

(一九七一至一九七六年)

第一章 终点站日本

辞别东京——外交官生涯的结束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七日的日程表上写着：“十一点钟，向天皇作离任拜会”。这是许许多多记载中的一项。但是对我来说，它却标志着一个漫长的、变化多端的职业生涯的结束：既是五年半驻东京大使任期的结束，也是二十五年从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工作的结束；此外，按照惯例——确切地说，按照公务法——，如果把我的学术生涯也计算在内，这也是我担任四十多年公职的结束。我连续在国外度过了十八年，在此期间担任了高级外交职务。法定的年龄限制为这种生涯安排了一个正常的终结。这样一种归宿，我始终认为是适当的。该是回家的时候了，到了向年轻力量让位的时候了。

虽然我感到在日本度过的年头直到最后一天都是非常值得的和有益的，并且真诚地敬重这个具有各种光明面和阴暗面的国家及其人民，但当我在那天早晨按日本的习惯穿着隆重的常礼服，同我的妻子一起最后一次迈进皇宫的时候，我对这次辞别却并无痛心遗憾的感觉。在日本生活了五年以后，我们对这次拜会的程序和仪式是非常熟悉的：几位宫廷官吏在宫门口迎接（经过战争

破坏以后，这座皇宫在六十年代初才重建起来，它保存了古典的质朴，无与伦比的美观，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皇宫只用于官方活动。天皇夫妇居住在一个很简朴的住宅里，它坐落在远离皇宫的一个停放车辆的区域），穿过大理石铺地的宽敞门厅，然后登上铺着地毯的平缓升起的露天台阶，来到一个半层楼高的胸墙，其整个宽度由一幅雄伟的壁画所覆盖，以绿—蓝—白相间的色调描绘海浪的波涛，它提醒来访者已到了一个海洋包围的岛国中心（这幅壁画的作者是画家东山，一位当代的艺术家，他经常去德国，创作了许多以德国的城市和乡村为题材的作品），通过长廊，从长廊的一侧可以看到用日本园艺建筑的全部技巧修饰成的非常美丽的宫廷内院；来到第一个客厅，宫廷典礼长——一位前驻伦敦大使——在这里欢迎我们，他在前一天的晚上还和我们一起参加了日本朋友为我们举行的一个小型送别晚会；然后是大客厅，天皇夫妇在这里迎候我们并随即坐下来开始谈话，天皇同我谈，皇后同我的妻子谈，过了好长时间，改换座位，交换谈话对手。天皇力求作一次友好的、个人之间的谈话，他审慎地避开那怕是稍微涉及一点政治的题目——，有些大使声称曾在这种场合同天皇讨论世界政治问题，这种回忆都是虚构的。皇后比较爽直、随便，她在过去的岁月里对我们始终表现了善意。外务省“德语学校”的两名年轻官员充任翻译，他们后来向我们承认自己当时很慌张，因为他们从未在宫廷里作过翻译。将近一个小时以后——大大超过了规定的时间——，相互握手、鞠躬告别，按来时的顺序离去。最后，宫廷典礼长向我们赠送有天皇和皇后亲笔签名的纪念照片（这是天皇和皇后分开拍的两张照片）。我们最后一次回头望了一眼皇宫。

离任拜会按其性质没有上任拜会隆重。上任拜会时，天皇接见大使及其几名工作人员，在场的还有外务大臣，但没有夫人参加。拜会时递交国书，庄严地相互致词，用一成不变的词句表示友好之意。召回国书不由离任大使本人而由他的继任人递交，因此，这样

的离任拜会不是非作不可的，多数情况下也根本不举行。与五年半前我怀着探索的、多少缺乏把握的好奇心所作的上任拜会相比，这次离任拜会是在建立了牢固的个人关系这种熟悉而有把握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个结果在较短的任期内恐怕是难以达到的。

我现在是否真的清楚，我拜会的那个人究竟是个什么人？对裕仁这个历史人物的形象依然是有争议的。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说，即使花了五年多的时间，也难以洞察象幽灵一样无法透视的权势斗争，并弄清各方应负的责任。对未来的历史学家来说，有许多问题还是不清楚的。但是这个我与之打过交道的人，这个实际上已不许再当君主的君主，这个谦逊的、腼腆的学者形象的人，常常唤起我对他的尊敬和真诚的同情。

从拜会天皇起，开始了最后一轮告别活动。我相继拜会了执政党的上层人物，他们刚刚进行过激烈的争权斗争。在这过程中，我意识到我同这些相互倾轧的各派人物都保持着很友好的关系，因此对他们表示祝愿时不能厚此薄彼。这时我心里有着一一种奇怪的感觉。我曾约定时间，去向外务大臣宫泽喜一作离任拜会，但当预定时间将要接近时，他却突然不再担任这个职务了。我对他特别欣赏，他是一个开朗的、愿意提供情况的会谈伙伴，同他谈话颇有裨益。一次去广岛访问时，我结识了他的兄弟，他在那里当知事。我也认识他的另一个兄弟，原任驻慕尼黑总领事，后任驻波恩大使馆公使。因此，即使在宫泽辞去外务大臣以后，我仍坚持去他那里作一次离任拜会。在这个议员和党务活动家的小办公室里，我们交谈了一个小时。正如我确信的那样，他的前程还没有终结。新任外务大臣小坂善太郎后来会见了我，他也是我的老相识，常到我家里作客。外务省的工作效率很高：尽管他上任还不到二十四小时，但外务大臣赠送的传统的送别礼品——银制香烟盒却已刻上了他的亲笔签名。这一天，总理大臣三木武夫从一大早开始就参加国会辩论，下午继续开会，整天都排满了日程，仅有很短的午休时间可供支配，而他却为我牺牲了其中的一大半。

我在他就任总理大臣以前很久就认识他。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曾一起度过了一个很长的晚上。当时，三木武夫夫妇俩向我们介绍了他们在四国岛家乡选区的分工情况。我对妇女在今日日本的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由此大大地加深了了解。对德国和德国的政治、社会设施，三木一向怀有浓厚的兴趣，不论是政党经费还是共决权，在他看来似乎都是范例——也许有时太理想化了。甚至在近东政策问题上，他在去阿拉伯国家履行一项特别使命以前，还曾征求过我的意见。在告别拜会时，他对我的工作作了特别热情的赞许。我回答说，他的话使我感到汗颜，因为我的工作没有留下突出的痕迹：没有签订友好条约或商务条约，没有开设文化机构，没有举办大型展览会，贸易额没有大幅度增长，没有危机需要缓和。对于德国驻东京大使来说，他的个人问题就是两国之间不存在任何问题。三木反驳说，相互关系能在持久的、平稳的和友好的轨道上发展，不能希望有比这更好的情况了。他说我为此作出了重大贡献，我没有必要低估这一功绩。

谁会在这样的时刻反对这个论点呢？但德日关系中“没有问题这个问题”确是一个事实，这在德国驻东京大使的工作中是始终可以感觉到的，这种情况使双方外长和政府首脑的许多次会晤显得轻松而无所谓，并且有时使大使不由地觉得自己实际上是多余的。

第二天，我和三木最危险的对手、不久就取代他而成为党总裁和政府首脑的继任者福田赳夫进行了类似的谈话；另一天，我又见了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另一个争夺者——大藏大臣大平正芳，他后来出任执政党干事长，现任总理大臣。一九七四年秋田中倒台以后，这两个人在争当继承人的争夺中势均力敌，为了摆脱这种无望的僵局，三木出人意外地被自由民主党一位有影响的老人椎名提名为折衷的候选人。两年后的今天，各派阵线都倒转了过来：椎名对三木发动了围攻，福田和大平在这场斗争中结为盟友。人们猜测，他们二人已秘密约定，保证让大平作福田总理大臣的继任人。对我来说，他们两人都是老相识和熟悉的谈话伙伴。一九